

# 1 北京发轫

3月初并非一年中去北京的最好时节。这时的空气潮湿、冷峭，天空总是阴沉多云。由于几百万个家庭、机关和工厂整个冬天都烧煤取暖，天空中布满巨大的云团，或者说弥漫着半凝结状态的烟雾。而早春的潮气使这种云团或烟雾显得更加浓重。这就遮蔽了西部和北部的山峦。在气候宜人的季节，这些山峦给这座平淡无奇的庞大城市平添了一道亮丽诱人的风景。

城里没有多少常青植物。城内的每条道路两旁都有繁茂的花木，在其他季节会绽放出美丽怡人的鲜花，而这时却仍处在严酷的冬眠状态。高耸的办公楼和住宅楼，还有城中那纵横交错的宽阔的街道，看上去光秃秃的，毫无生气，对新来客既没有感召力又显得很冷漠。北京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是一座象蚁山一样人头涌动的城市。到处都是人。中国人喜欢户外活动，而在一年的这个时节，他们冒着严寒，比在温暖的季节走得还

快。他们穿着好几层衣服。这是中国人传统的严冬御寒的办法。这同人们，特别是同儿童和年轻人在其他季节穿的轻便的、多彩多姿的衣服相比，给人留下一个单调划一的印象。

1991年春天给我这个新来客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活力与繁荣。就全中国而言，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百分之七的速率在增长。城市的增速比这还要高得多。中国人希求的物质福利，亦即衣、食、住、行，显然都大大得到满足。每条街道都是一个繁荣的市场。1991年，60%以上的农产品是由私人销售的，其中大部分是由农民及其家庭成员设在街头的摊位销售。人们显然是食丰衣足。食品店和服装店货源充足，购销两旺。这是物资丰盈的明证。一两年之前所有的人都穿的那种黑帆布胶底鞋，很快都被大量中国生产和进口的西式皮鞋所取代。在春节或其他节日，普通老百姓在回答别人的问候时能够而且确实是经常这样说：“每天都像过年。”这不是一句普通用语。这是我的中文老师给我讲的。他很可能只想用这种方式向外国人表示，他对新中国的富足和稳定感到自豪。长期以来，中国人曾一直遭受盘剥、苦难和动乱。在1960年到1961年的大饥馑时期，估计有两三千万中国人死于饥饿。随后就是十年文化革命那严酷而痛苦的状况。而现在，每天都有充裕的食品、衣服和家庭欢乐，公众和个人昔日遭受的苦痛和折磨都一去不复返了。

这就是中国，就是为在本世纪最后 20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而奋进的中国。翻两番这一目标，是政界元老邓小平和党的领导人在 1982 年举行的第十二次党代会上确定的。1989 年春夏之交北京政治风波之后，中国并没有蜕变成一个更加刻板、更加封闭的社会，也没有倒退到“抗议和镇压的恶性循环”之中去。1991 年的早春，迎接我这个北京新来客的是这样一番景象：充满活力的经济，日益显现的市场力量，开放的气氛。这一切只用经济术语是决难以表述的。对一位新委派到以色列科学及人文科学院驻北京联络处任职的以色列外交部使节来说，这样一种形势和总的氛围，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他同北京官方接触，仍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学习的过程，起始于初次接触。在机场的边防检查站，两个穿军装的年轻人见到我时显然是大惑不解。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熟悉以色列护照及其上面的希伯来文印记，而更主要的是因为，护照虽然无需倒着看，却需从后往前翻。我踏上中国土地后说的第一句中国话，就是向他们解释：我来自以色列；护照上那些古怪的文字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是从右向左读；因此，护照需要从右向左翻。但是，令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这种稀奇古怪的洋鬼子的怪玩艺儿。我一说到以色列，他们就不由绽放出中国人特有的迷人的笑容，年轻的脸上熠熠生辉。他们对我说：“以色列

强大，以色列有实力，以色列自力更生。”“自力更生”是一种非常令人敬佩的毛主义品德。这个词经常出现在中国的套话和俗语中。

这是我第一次同中国人接触，它非常说明问题。这两个年轻人对以色列的了解，只能通过他们经常阅读和收听的中国媒体的报道。而中国媒体报道的总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它对阿拉伯邻国的侵略行径，它对国土被它占领的巴勒斯坦人的残酷镇压，它对西方帝国主义及其利益的奉迎。然而，他们根据本能的常识，却从这种说教和反对以色列的宣传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正如一位中国朋友后来对我所说的那样，在以色列最近所犯罪行的报道中，他们从电视新闻广播或人民日报版面上看到的，却是那张中东地图，那张包围着以色列的广大阿拉伯领土的地图。他们由此明白了，小小以色列却能够对付那些穆斯林乌合之众，能够坚持不懈地对付盛产石油的广大阿拉伯腹地。以色列的这一形象赢得他们的尊敬，而不是敌意。中国人习惯从字里行间寻找微言大义，习惯从官方媒体提供的材料中作出自己的判断。我后来接触的一些中国人，虽然他们都是平生第一次碰到以色列人，但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反应，却几乎总是同北京首都机场那两个准军事人员首次表露出来的反应一模一样，积极而又热情。

从这初次接触中，还可以得到另外一个重要启示。在对以色列客人表示最热情、最友好的欢迎的时候 那两

个年轻中国人并没有相互提防，也没有担心这样做会不会违背上级确定的统一口径，会不会违背官方正式确定的对以色列的态度 即使不敌视 也要对立。我看到的是毛之后的中国 经历了“第二次革命”的中国 进入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具有更广泛思想和言论自由的中国。

我在北京开始第一轮拜访活动。当然，我不像一些大使那样，按正式开列的名单进行拜访。对一位新上任的大使来说，他履新后的最初几周和几个月时间，都会用来进行正式拜访活动，要拜访官方人士，还要拜访大使同僚。这些活动会帮助他结识一些适当的人士。在后来的日常工作中，他在许多问题上会征询这些新结识的人士的意见，而他们也会给他出主意。在正式场合和招待会上，他会经常见到这些人士。这些人士构成一种非正式的职业行会，而他自然是这种行会的一个成员。

我自己的情况全然不同。我在外交界和正式场合没有身份和地位。驻在国政府希望我保持一种低姿态，身份是学术机构顾问，不能公开闯入正式的外交场合。我自己也无意于参与那种活动。一些驻北京的大使，有的是我过去任职时认识的，有的是从我们都认识的朋友和同事那里获悉我到任的消息的。他们知道驻在国政府对我的特殊地位所持的保留态度。这有可能妨碍他们同我接触。另一方面，根据我来北京前作出的安排，我同外交部的接触起初确实只限于西亚北非司。

北京有 1000 万居民，100 多万辆自行车，以及两轮

和三轮大车、卡车、出租车和私人车。对一个外国人来说，第一次贸然来到北京这样一个特大城市宽阔的大街和拥挤的人行道，有一个中国司机至关重要。在中国，懂英语是一种罕见的、因而也是一种珍贵的商品。连派到外国商行和家庭中去服务的人员也是如此。除非通过官方的为外国人服务的职业介绍机构，外国人是不得雇用人员的。外交部有自己开办的外交人员服务局，给大使馆和外交人员住户提供各种当地雇员。这些雇员实际上都是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在两国终于建立外交关系，我们的联络处变成大使馆之后，我们曾要求委派可靠的当地人员协助工作。他们答应了我们的要求，给我们委派了两名资深的当地雇员。这两位雇员曾被派到中国驻巴格达和开罗的大使馆任低级外交官，不久前才结束任期回国。他们极为难得，带领我们穿过了北京官方及其官僚机构那一道道迷宫。他们不但经验丰富，乐于助人，而且颇具人格魅力。

外交部的外交人员服务局同外国大使馆签订雇用人员合同，代当地雇员领取工资。这不仅是一种控制制度，而且是外交部的一个收入来源，因为外交部只将支付工资的一半转交给雇员本人。但是，它给雇员提供像政府和国有企业提供给职工及其家属的那些服务设施和社会福利，诸如医疗，教育，甚至住房。此外，雇员通常还能直接从外国雇主那里拿到双方都认可的额外工资。仅此一项就会比当地部门同类职工的平均工资高好

多。

我们的当地雇员在最初阶段是由一家为外企服务的政府机构提供的。司机和厨师都不会讲英语。不然的话，他们也许会从事工资收入更好的工作。从第一轮拜会活动的时候起，我就向司机发号施令。他开始总称赞我的中文讲得好，甚至说我的语调也好（普通话有四声，每一个声调会使一个字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假使我谨慎从事，不被吹捧所惑的话，我也许会认识到，我仍然需要努力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我有时被送错地方。但我的司机从来都不对我说，他并没有听懂我的中文。这往往使我们两个人都很尴尬，都很丢面子。当然，司机和外国雇主之间的文明气氛，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关系准则，远比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到达某一个地方更重要。这样，我就认识到，要作出礼貌的反应，就需要作仔细、恰当的解释。因此，我总是运用我所掌握的中文的所有同义词，反复说明我要他干什么，直到我确信我的四声的确是清晰无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一下子就到达目的地。在中国，迟到是不礼貌的行为。中国人总是对外国人的行为采取忍让态度。但是，在新华社总社，我们的东道主并未因此而对我感到满意，因为我显然没有充分认识到初次拜会他们的重要性，因而需要及时出发，无论如何也要早点到达。只有在我向他们讲述过我的中文和我的司机的故事之后，他们才松了一口气，疑虑消解。

我到北京一两天之后，作为以色列科学及人文科学院驻北京联络处的接待单位，中国科学院特意为我举行了第一场欢迎宴会。这就清楚地说明，我自己的正式身份是什么。然而，我到达刚一周时间，竟来到外交部的会客室。这间会客室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其小说中描绘的那种老式客厅的中国翻版，里面摆着不知从哪朝哪代遗留下来的笨重而又豪华的老式扶手椅，挂着巨大的枝形吊灯，还有沉重的锦缎窗帘。我受到有礼貌、甚至是热情的接待。初次接待我的是西亚北非司副司长，几天之后是该司的司长，大约一周之后是负责我们那个地区事务的副部长。这位副部长提醒我说：“现在，外交部是提出双边问题和政治问题及有关活动的场所。因此，我们希望你不要把这些问题弄到别处去，不要去找其他人。政治问题在这里处理。”

很明显，他们欲将这番话变成我起初活动内容和活动范围的指导原则。这番话听起来起码也是他们对我感到不安的表示，因为我已经同媒体和公共机构进行过各种各样半官方式的直接接触，也许还因为他们认为我在这些新的接触中开始议论的内容有什么问题。同时，这番话也等于正式确认了我作为政治官员的作用，即代表以色列政府，负责同中国外交部进行对话和交流。然而，我仍有必要在外交部以外探索进行接触的现实可能性及其局限性。现有的接触，正如我在前边提到的，主要是同官方的、政府办的新华通讯社的接触，还有同一

些报社的接触。报纸本身也能成为一种权力，就连在中国亦如此。类似的情况是，《人民日报》不时地构成现政权和共产党内的一个权力中心。此外，外事研究和情报搜集机构都是为北京的各级政府服务的。其中有些是通向领导层的直接渠道。它们的工作人员对同外国人建立接触很感兴趣，反过来说当然也是一样。刚到北京的时候，我的同事和我在这些方面都找到了合适的关系人。作为准学术机构，它们是我们关注和主动争取的全然合法的目标。就它们来说，在对我们的行动作出响应时，它们似乎既没有遭到制止，也没有受到限制。

两国外交部为进行新的正式对话而要采取的下一个重大前进行动已经在运筹之中。在我们的相互接触中，作为东道主的中方总是向我重申，一个重要的指导原则是，开展这种接触的势头应有一个速度限制。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说法“一步一步走”。我们中国外交部的东道主，每感到我把加速器踩得太狠了一点，就提醒我要注意这个原则。他们采取的下一个行动是，同意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麦宇仁秘密访问北京。麦宇仁曾在 1986 年之后采取主动行动，同新华社香港分社恢复政治接触。当时，他任以色列驻香港总领事。他指导并参与了建立驻北京联络处及后来提议我在联络处任职的整个工作过程。

他的访问定于 3 月下半月，亦即我抵达北京几周后进行。这将是以色列外交部官员首次访华，虽然是秘密

访问，但却是由中国外交部接待。应中国方面的要求，我和联络处的同事们只能持公务护照。而这次，一位以色列外交护照持有者却被颁发给访问中国的正式入境签证。这在 30 多年来还是第一次。在过去，无论对以色列旅游团，还是对秘密或私人访华的以色列官员，发给的都是旅游签证或团体签证。他们首次获准入境来中国大约是一年之前。

1991 年 3 月 14 日，亦即在麦宇仁预定到达北京之前的一周左右，以色列的英文报纸《耶路撒冷邮报》刊登了一则报道，标题是“麦宇仁即将到北京举行会谈”。报道说，他将同外交部长钱其琛举行会谈。同一天，这家报纸在内页上还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澳大利亚人，过去在北京当过低级外交官，现住耶路撒冷。在谈到这次消息不幸泄漏时，他评论说，“鉴于中国官方对以色列关系上的偏执态度”，这次访问有可能被取消。这则消息很快就被香港报纸和国际上的其他报纸转载了。

翌日，我首次拜访北京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我同该报编辑部人员会见的时候，联络处给我打来紧急电话。电话说，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副司长紧急约见我年轻的同事和副手约埃尔·吉拉特。说起来有点戏剧性：当着《中国日报》主人的面，我和吉拉特当即进行讨论。讨论决定，吉拉特向《中国日报》东道主表示歉意，退出会见，直奔外交部。在后来的几周中，我们同

《中国日报》人员定期见面。但是，他们之中任何人从未提起这次紧急召见，更没有表示要打探召见的消息。如果说他们确实对我们同外交部接触这件事本身感到吃惊的话，他们确实也没有表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你尽可放心，中国记者是非常谨慎的，他们是有职业责任感的，对事务是有很好的判断力的。中国有无数俗语和格言。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俗语和格言是如何正当行事的箴言。其中之一是：“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

吉拉特很快赶到外交部大楼。他在那里得知，外交部对耶路撒冷把消息泄漏给新闻界感到很生气。他们说，为安排这次访问（也就是说，为使上级批准他们的建议），为发展官方接触而向前迈出这重要的下一步，西亚北非司的人非常努力。由于消息已经曝光，有人主张现在应推迟这次访问。但是，经过反复考虑，最后还是决定，访问照常进行。这是我们与中国同僚的第一次交锋。后来，我们又有多次这样的交锋。在这些交锋中，对向耶路撒冷报刊泄漏我们私下讨论的问题，特别是泄漏秘密访问的问题，他们总是表示沮丧和失望。

中国还不愿意同以色列公开接触。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展开审慎的交流。在他们看来，我们的游戏规则是，在完全秘密，也就是绝对保密的条件下，逐步开展和加深双边对话和双边关系。他们希望，既不要引起、也不要招致他们的阿拉伯友邦的抗议和干

预。对此，我很清楚，正是在上述基础上，最高层才给外交部打开绿灯，同意同我们开展接触，甚至走向关系正常化。这也就是说，一切要逐步展开，一步一步走，时机的选择至关重要，一切以中东地区本身的事态发展为转移。从西亚北非司对耶路撒冷新闻泄漏事件的反应来看，我感到，在采取逐步前进政策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他们还想极力避免更高决策层变卦，避免重新考虑给外交部开放绿灯问题。挑战还会来自阿拉伯各国政府和政党领导集团中的老朋友，来自受到驻北京的阿拉伯或穆斯林国家外交官警告或骚扰的外贸机构，或直接来自阿拉伯各国。在他们看来，破坏游戏规则，向国际媒体泄漏消息，只能是提醒有关各方对我们双边接触中的这个关键的第三阶段提出质询或疑问。他们一直不能理解的是，不顾对我们的共同努力可能造成的损害，那么多消息是如何及为什么泄漏给耶路撒冷的报刊。他们虽然没有说，但经常使人感觉到的是，他们想必是认为，这只能是耶路撒冷方面蓄意而为之。

此时此刻，我得到的唯一帮助和指导，是我们耶路撒冷外交部以外交部发言人的方式发表的答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的评论只限于总司长对苏联的访问，而没有谈到他进一步的行程。关于这个问题的传言，外交部对一些新闻报道不予置评。”来自耶路撒冷的这种提示，只会引起人们的联想，而不会打消人们的猜测，因而对我们没有一点用处。如果在我们同西亚北非司接触

时引用这些话，那纯粹是失策。

在麦宇仁抵达北京前几天，我同西亚北非司司长有一次会晤。我利用这个机会对即将到来的这次访问的新闻报道表示歉意。我同时表示，对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共同任务来说，相互信任非常重要，希望这种信任不会受到损害。他则回答说，他的副手先前已向吉拉特提出过这个问题，他无意再同我提这个问题。但这并非表明，这个问题无关宏旨，只需在较低的级别上提出。相反，这表明，除了对即将进行的访问造成的威胁之外，这个问题还令人非常生气，令人非常不快。因此，他们已决定，不在最高级别的讨论中提出这个问题，以尽量减少他和我个人之间的尴尬，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在现阶段重新讨论这个问题了。从中国人委婉圆熟的处事手法中，我学到很多东西，这就是其中之一。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的东道主提出一些相当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对一些相当重要的问题，不管多么令人感到不快，只要有必要，他们还是会在最高级别的讨论中提出来的。

同西亚北非司的初期会晤都是业务性的，气氛是客气而友好的。他们接待我们时的微笑，只是表示欢迎。其实，中国人的微笑多种多样，且都富于表情。同实质性的讨论和议程开始之前那种口头欢迎仪式和例行客套相比，他们的微笑有时更富于表情。只要你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对微笑进行解释，你就会发现，在中国，微笑在大多数场合都有用场，表达多种多样的态度和反应。

严肃的表情和作鬼脸不一定就表示不同意或不高兴。在中国供职的外国人，即使连最常用的一些中国话也学不会，也仍然需要学会分辨微笑和大笑之间的微妙区别，学会对某些微笑和大笑进行解释。在当初的一些会晤中，我发现有的微笑表示欢迎，有的表示拒绝或保留，有的则表示捉摸不定。在结识中国人时，如果我发现他对同以色列人接触感到疑虑不安，我觉得最得体的办法就是报以微笑，暂不接触，而不是投以抗争或拒绝的目光。

除了天生的谦恭有礼之外，中国人还对在下这个来自以色列的新洋人特别感兴趣，特别好奇。中华民族是一个怀有好奇心的民族。他们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尤其是对不寻常的和陌生的事务极为警觉，极为感兴趣。在我们接触的中国人中，大多同中国与中东的关系有某些联系。其中，很多人到过阿拉伯世界。而对西亚北非司的大多数工作人员来说，他们的整个外交生涯是在中东地区度过的，或者是在同中东事务打交道中度过的。他们讲阿拉伯语，那是他们的第二语言，只有很少几个人讲英语。在同我们的接触过程中，他们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们对一个国家的代表很感兴趣，因为这个国家同他们的本职工作和职业生涯非常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但过去他们却根本“不可接触”这个国家。此外，在我们一起从事促进相互关系的工作中，我感到，那些欢迎同我们接触的人，如果说不是有什么既得利益的

话，倒确实是有一种义务感。

在西亚北非司初期的会晤中，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海湾战争，包括这场战争对中东地区未来的稳定、对和平进程的前景以及对以色列与其邻国之间问题解决的影响。中国在对付和制裁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在安理会辩论中的主张，我们都很感兴趣，都很关注。我们任谁都没有预言或猜度，海湾战争将对阿拉法特及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产生什么影响。我们也没有预言或猜度，阿拉法特对伊拉克的支持将使他在争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方面蒙受多么惨重的损失。正因为损失惨重，他后来才被迫同以色列走向和平进程，被迫在这个进程中就他自己的作用和形象问题作出让步，至少在开始时是如此。

中国强烈批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总是对巴解组织驻华大使说，他们对巴解组织支持伊拉克很不满。但是，他们并不支持西方的军事干预。他们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实施制裁的决议，但是，对准许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 678 号决议，他们投了弃权票。他们投弃权票，实际上是对使用武力持强烈保留态度。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中国人对所谓美国“霸权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担心，因为它们利用这个机会在联合起来，意欲在这个地区建立一种新秩序。我自己对中国的立场的评断是：他们既担心他们的商业利益会遭受损失，也担心一个有几万名中国劳工的地区的建

筑业会遭受损失。万一出什么事，这些劳工将不得不回中国，把拖欠中国的巨额债务留下来。要收回那些债款需要很多年时间，到时也只能部分收回。

但是，在当初的会晤中，我们所讨论的比较迫切的问题，却是总司长麦宇仁来访的日程。这将是中国和以色列两国首都的外交部人员正式、秘密互访的第一步，为两国副外长和外长级的互访作准备，从而也为两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作准备。从 1955 年 1 月以色列代表团访问北京以来，这将是两国首次有机会用四天时间深入、全面交换意见，而以前只是在纽约和香港举行短暂的、偶尔的会晤。中国国际旅行社驻特拉维夫办事处主任是中国外交部的官员，曾在中东其他地方任职。他的一位助手是第一个会讲希伯来语的中国外交部官员。麦宇仁作为中国外交部的客人来访，就会使驻在以色列的中国国际旅行社办事处人员同设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外交部就政治问题经常进行接触和交换看法，就像我们在北京进行的接触那样。

在麦宇仁来访前夕，我们作出的评估是，我们的东道主把这次访问本身视为我们在相互接触中向前迈出的的一大步；但在两个办事处的非官方地位问题上，我们不要期待他们就进一步采取措施或改善办法提出什么具体建议。改善两个办事处的地位问题，一直萦怀于我们的心头。从形式上看，我们在北京的日常活动是促进和加深两国在文化、科学及农业方面的交流与互访。但是，

在促使这些活动经常化的同时，我们的目的却是开创一种官方的、政治的交流与互访经常化局面。这些活动本身相当于建立经常性关系，最后导致两国关系正式正常化，亦即建立外交关系。